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政府补贴效果研究

——来自中国沪市 A 股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吴成颂,黄送钦

(安徽大学 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以 2008—2011 年中国沪市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视角,对政府补贴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存在社会性效果,即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来激励企业扩大社会捐赠额、吸纳更多就业人数和增加技术人才投入是有效率的。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补贴效果在不同性质股东控股的企业中具有不同的表现;政府补贴效果仅在当年盈利的企业中存在,表明政府补贴效果受企业盈亏状况的影响;政府补贴效果不受市场化程度的干扰,但该效应的显著性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却表现出明显差异。就政府的公共政策而言,政府补贴通过补贴形式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实施公共政策中必须甄别企业特征及其所在区域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政府补贴效果;政企关联;市场化指数;转移支付;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社会捐赠;企业社会责任;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政企博弈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4)06-0092-12

一、引言

在我国,政府与企业尤其是与国企的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如何去应对政府环境、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构成了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2]。政府补贴作为一种政府对公共产品市场进行干预的财政支出方式,属于有条件的转移支付范畴^[3],为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提供了契机。随着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主体多元化和区域复杂性的提高,社会公共领域的突发事件日益增多,政府单方力量在当今社会发展中难以迅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救助事宜,在此情况下,需要多部门、多领域的组织进行协助承担社会责任,其中企业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经济主体之一。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补贴间内在逻辑关联为我们当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在现实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一般都是重复博弈,当企业配合政府完成了救济任务后,政府必然会给予企业相应的回报^[4]。政企间重复博弈行为一般可以有两种动机类型:一是企业被动地履行社会责任,即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干预经济的方式激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3,5-7]。二是企业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即企业通过协助政府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方式来构建亲密的政企关系,为赢取政府青睐和获取稀缺性资源提供便利渠道^[4,8]。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前者(即企业被动地履行社会责任)。

[收稿日期]2014-07-0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71302113);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扶持和强化项目(yfc100308)

[作者简介]吴成颂(1968—),男,安徽怀宁人,安徽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市场、投融资评价;黄送钦(1989—),男,湖北黄石人,安徽大学商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银行治理。

对政府补贴的效果进行深入考证有利于人们了解当前我国政府补贴的效率性,也对我国地方财政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政府补贴的效果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部分研究从政府补贴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两个角度进行了研究。Jenkins 等认为,美国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财政补贴在促进就业方面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5]。唐清泉、罗党论发现,从补贴效果来看,政府补贴没有增强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但却有助于上市公司社会效益的发挥^[3]。余明桂、回雅甫等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及社会绩效负相关,而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及社会绩效正相关^[6]。但 Harris 却发现,爱尔兰政府对制造业的补贴在促进社会就业方面并未起到积极作用^[9]。在比较河南省和江苏省上市公司的补贴绩效后,申香华也发现,接受政府财政补贴的公司在促进就业、缴纳税款、提供社会捐助、增加环保投入或支出等方面并没有显著的贡献^[7]。

也有学者基于企业创新投入的视角对政府补贴的激励效率进行了探究。戴晨、刘怡研究了财税工具对企业研发投入(R&D)的影响机制,他们发现,财政补贴对企业 R&D 投资具有激励作用,并且具备针对性较强、反应迅速快捷等特征^[10]。刘虹等研究发现,政府 R&D 补贴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效应的分布图呈“倒 U 型”,并存在最优政府补贴值^[11]。肖志兴等认为,政府补贴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贡献十分显著,但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对政府补贴的激励反应更为灵敏^[12]。

还有学者从企业效率的视角对政府补贴的效果进行了分析。Tzelepis 等以希腊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政府的投资补贴对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是没有效率的^[13]。邵敏、包群采用广义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刻画了不同补贴收入水平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差异,他们发现:当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力度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政府补贴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当政府补贴力度在该临界值水平上逐步提高时,这种促进作用也由显著变为不显著,但其对企业生产率变化的抑制作用却逐渐显现;当政府补贴力度提高至大于另一临界值时,政府补贴显著地抑制了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14]。

从国内文献的研究现状来看,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来激励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即政府补贴的社会效益已引起了部分学者的重视^[3,6-7],但在政府补贴的社会效果方面,研究者们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同时,有关政府补贴社会效果领域的文献依然较为稀缺。除此之外,先前文献尚存在研究内容上的缺陷,如它们均未考虑企业所有权性质(本文主要体现为控股股东性质)、企业当期的盈亏状况和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政府财政补贴激励效果的影响。因此,针对当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本文以 2008—2011 年中国沪市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视角,对政府补贴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力图在如下方面有所创新:(1)我国转型加新兴的市场特征决定了与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并据此获得所需要的资源成为众多企业的选择^[15-16]。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国有控股企业在建立政企关系、获取政府资源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然而,在政府补贴的效果发挥方面,这种先天性政企关联是“激励之手”还是“损害之手”,尚属未知。本文将带着该疑问对此进行详细分析,从一个具体路径研究政府补贴的社会效益问题,这将丰富和增进我们对政府补贴效果在不同类型公司中不同表现的理解。(2)只有当公司的捐款行为与公司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能力相对应时^[17],这种企业社会行为才是符合经济理性的。然而,先前的研究均未对企业经营现状进行区分,这无形中等于承认了“不论是盈利企业还是亏

损企业,都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论断,显然这与“理性经济人”观点相悖。鉴于此,本文在区分当期企业盈亏现状后将进一步研究了政府补贴的社会性效果,从而扩展该类研究的视角,丰富现有的学术文献。(3)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种特定的差异性特征为我们检验这一政府补贴效果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场景。虽然余明桂等初步探究了地方制度环境对获取政府补贴的影响,并认为相对于制度较好的地区来说,民营企业政治联系的政府补贴效果在制度较差的地区更强^[6],但是他们的研究并没有阐述不同市场化进程地区的政府补贴效果的表现路径,而是抛开市场化进程的影响笼统地探讨了政府补贴的有效性。基于此,本文将在他们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探究在不同市场化水平地区企业的政府补贴效率的表现路径,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识别和解释政府补贴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途径。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20世纪80年代初依次实行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与行政自主权日益加强,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18]。随着市场竞争和地区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及出于对地方财政创收、就业增加和官员职务晋升等方面的考虑,地方政府对待企业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19]。在此背景下,为了获得政治青睐和赢取“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干预管辖内的经济^[20],其中财政补贴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直接手段^[21]。政府补贴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有关政治、经济的方针和政策,按照特定目的,对特定事项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的一种补贴,是直接或间接向企业提供的一种无偿的转移^[3]。可见,政府补贴是一种具有目的性激励的财政转移方式,即政府建立社会目标,期望提高上市公司社会效益的一种直接的政府干预手段^[3]。根据公共管理理论“政府公共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权力的让渡”的观点,政府的作用是受托解决社会公共事务。通过有效使用和配置公共资源以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将公共资源以财政补贴的形式配置给营利性组织,意味着营利性组织比政府能提供更多的公共利益^[7]。因此,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以及维护稳定和政府形象等目的往往考虑给予上市公司补助^[22]。可以说,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手段激励作为营利性组织的企业主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可以达到社会整体居民福利最大化,这也是一种公共福利的效率选择。这种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利益诱导方式来激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资源配置现象,我们称之为“企业被动型补贴效果”。

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要面对竞争的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而政企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的非市场环境^[23-24]。企业之所以建立或维持政治关联是为了获得更有利的经营环境或经营条件,包括从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享受更低的税率以及获得进入政府管制行业进行经营的许可等,甚至获得财政补贴^[8]。余明桂、潘红波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而且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治关系的这种贷款效应更显著^[25]。不难发现,政治关系可以使企业拥有更多的外部融资便利,从而降低融资约束^[23,26];同时,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低,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其融资的帮助越明显^[26]。罗党论、刘晓龙还认为,民营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系越好,其进入高壁垒行业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所获得的经济绩效要显著高于其他企业^[27]。所以,针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象,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构建和强化政企关联的有效途径^[4,8]。薛爽、肖星以汶川地震后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捐赠数据为样本,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是策略性的,其利用捐赠巩固政治关联,从而进一步获得政府的支持^[8]。张敏、马黎珺等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的慈善捐赠具有明显的政企纽带效应,是强化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4]。这种企业以搭建或维持与政府间关系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行为,我们称之为“企业主动型补贴效果”。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政府补贴呈正相关性,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支出也就越多,即政府补贴的社会性效果就越强。

进一步地,我们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政府补贴之间的上述关系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可能更加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作为政府部门控制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承担着更多的有关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政策性负担,造成企业目标之间相互冲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着企业的股权和管理者任命权^[24],并可能决定管理者的政治晋升;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并非单纯地以价值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而是具有多重目标性,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替政府承担一定的政策性负担,维护社会稳定。除此之外,从干预成本来看,政府对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干预成本小于对非国有企业的干预成本,因为从产权性质来看,政府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并不存在紧密的产权关系,两者间行政命令式的政策性干预较少,非国有企业考虑更多的可能是自身资源配置和经营的市场化。由此我们容易得出,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国有控股企业可能在政府补贴的激励下付出更多的努力。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社会性效果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显得更强。

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组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有经济动机的,企业按照经济规律去承担社会责任才符合经济理性。一般而言,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和选择性,但盈利能力较弱,甚至当期经营亏损的企业在面临承担社会责任时,其首要责任是“扭亏为盈”,而不是勉为其难地承担过重的社会性负担。另外,为了达到提高地区企业竞争力和地方政府政绩的目的,政府还具有向出现亏损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的偏好^[7],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而不是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一味地激励企业承担社会性任务。山立威、甘犁等研究发现,公司捐赠行为是由自身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能力所决定的,业绩好的公司捐资总数和现金捐资数量更多^[17]。所以,我们认为,在面临社会责任时,企业需要的不是“一腔热血”,而是“量力而行”,应该根据企业经济能力来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限定其他条件,相对于当期亏损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社会性效果在盈利企业中显得更强。

我国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国家方针政策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可能导致政府补贴效果在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表现出较大差异,可以说,这种特定的差异性特征为我们检验这一效果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场景。因此,地区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能够很好地刻画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28],有助于我们理清企业与政府间利益关系博弈的内在逻辑。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由于政府干预频率较少,企业与政府间关系更为透明,政企关系色彩清淡,企业经营运作可能更多的是秉承市场化理念,因此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形式激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效果可能是无效的;但在市场化较低的地区,这种政府补贴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恰恰相反,即政府补贴的效果可能是有效率的,因为由于政府掌握着企业发展的众多稀缺性资源,为了构建或维持与政府间的关系,企业在政府财政补贴的激励下可能更乐意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限定其他条件,相对于处于市场化较高地区的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社会性效果在市场化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显得更强。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本文的样本包括中国沪市交易所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年度数据,选取时我们剔除了ST股、相关数据残缺和存在极端值的年度数据组。另外,本文将政府补贴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相关指标为0的数据组归类为异常值,并进行了剔除。本文所选用的数据包括上市公司的政府

财政补贴、企业经营特征和地区制度环境等数据,其中:(1)上市公司的政府财政补贴的数据均来自于沪市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并进行了手工收集整理。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均来自于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官方网站和巨潮资讯网等权威网站。(2)企业经营特征数据均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3)制度环境数据来自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包括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市场化指数体系^[28],由于 2011 年的制度环境数据难以获知,本文引用 2010 年中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数据作为替代值。

(二) 模型设置和变量定义

政府补贴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直接手段,已被地方政府广泛采用,主要是因为政府给予企业的补贴在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引导经济走向、维持社会稳定和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4],它可以有效地增加企业的资本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带动地区企业发展、增加或维持就业机会、获取未来更多的财政收入和改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3]。可见,政府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缓解社会矛盾的。另外,鉴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社会溢出效应对社会发展进步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文也首次将企业创新人才投入纳入社会效益指标体系中。因此,针对社会效益的度量标准,我们具体到企业社会捐赠、吸纳就业人数和技术创新人才投入等方面。

为了有效地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我们借鉴已有研究^[3,7]构建了如下模型:

$$Donation_t = \beta_0 + \beta_1 Subsidy_{t-1} + \beta_2 Size_t + \beta_3 Lev_t + \beta_4 Roa_t + \beta_5 Dual_t + \beta_6 Bsize_t + \beta_7 Idp_t + \beta_8 Top1_t + \beta_9 Btimes_t + \varepsilon \quad (1)$$

$$Employment_t = \beta_0 + \beta_1 Subsidy_{t-1} + \beta_2 Size_t + \beta_3 Lev_t + \beta_4 Roa_t + \beta_5 Dual_t + \beta_6 Bsize_t + \beta_7 Idp_t + \beta_8 Top1_t + \beta_9 Btimes_t + \varepsilon \quad (2)$$

$$Innovation_t = \beta_0 + \beta_1 Subsidy_{t-1} + \beta_2 Size_t + \beta_3 Lev_t + \beta_4 Roa_t + \beta_5 Dual_t + \beta_6 Bsize_t + \beta_7 Idp_t + \beta_8 Top1_t + \beta_9 Btimes_t + \varepsilon \quad (3)$$

其中, $Doantion_t$ 、 $Employment_t$ 和 $Innovation_t$ 分别表示企业当年承担社会责任所产生的费用成本(雇佣人数), $Subsidy_{t-1}$ 表示上一年度企业获取的政府补贴额度。变量具体度量方式说明如下:(1)对社会捐赠 $Donation_t$ 的度量,我们借鉴了山立威、甘犁等的衡量方法^[17],具体定义为“企业当年的社会捐赠额的自然对数”;(2)对 $Employment_t$ 的度量方法,我们参照了申香华的度量思路^[7],定义为“在职人员和离退人员之和的自然对数”;(3)对 $Innovation_t$ 的度量方式,我们采用“公司年报中披露的技术人员数的自然对数”的度量方法;(4)对政府补贴 $Subsidy_{t-1}$ 的度量方式,我们采用上一年度企业所获取的政府财政补贴数额,具体度量方式为上一年政府补贴的自然对数,之所以用当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的费用成本(雇佣人数)对滞后一期的政府补贴收入进行回归分析,是由于补贴对绩效的作用具有滞后性^[3],而且这样还可以避免回归分析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另外,由唐清泉和罗党论、余明桂和回雅甫等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3,6]可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在受到政府财政补贴激励的同时,其履行责任的能力还会受到企业本身经营特征和治理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借鉴先前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还控制了相关因素:企业规模 $Size$,其定义为企业当年的总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资本结构 Lev ,其定义为企业当年总负债额与总资产的比重;总资产收益率 Roa ,其定义为当年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其定义为当年第一大股东在公司股权结构中所持有股权份额;企业当年的董事会治理结构,主要包括董事会规模 $Bsize$ 、董事会会议次数 $Btimes$ 、独立董事规模 Idp 和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 $Dual$ 。

具体变量定义见下页表 1。

五、实证研究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主要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企业社会捐赠额度的自然对数平均值为12.5787,中值为12.6660,但企业间捐赠额度存在较大差异,如标准差为2.2405,最小值为5.2983,最大值为17.8740。就业人数规模自然对数的平均值为

8.2020,吸纳就业人数在企业间分布差异也较大,如最小值为4.9273,最大值为11.3933。在技术创新人才投入方面,技术人才投入的自然对数的平均值为5.9869,最小值为2.4849,最大值为9.7965。针对企业获取政府补贴的统计值,政府补贴的自然对数平均值为16.0546,中值为16.1020,但该额度在企业间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其最小值为6.4770,最大值为20.8508。另外,由样本统计量可知,本样本中的非国有控股企业占据更大部分,如控股股东性质的平均值为0.2300。在市场化指数方面,我国不同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依然存在重大差异,水平分布悬殊,如市场化指数的标准差为2.1937,最小值为0.1100,最大值为12.04,但总体的市场化水平处于较高水平,其平均值为8.9457,中值为8.9300。

(二) 总样本下政府补贴的有效性研究

表3主要报告了总样本下政府补贴效果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可以有效地激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有效支持,即“政府补贴的社会效应”假说得到了验证。

由表3可知,首先,政府补贴与企业社会捐赠间呈正相关关系,并在1%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172,T值为3.468),表明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来激励企业承担社会捐赠责任是具有可靠性的,即在政府补贴的利益诱导下,企业愿意履行相应的社会捐赠责任,结果支持了假设1。其次,政府补贴与企业吸收就业人数间呈正相关关系,并在1%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053,T值为3.525),意味着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财政补贴越多,上市公司可能愿意吸纳的就业人员越多,从而帮助政府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激励企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有效性,假设2得到了支持。最后,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间呈正相关关系,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解释
被解释变量	社会捐赠	<i>Donation</i>	企业当年社会捐赠总额的自然对数
	就业人数	<i>Employment</i>	企业当年在职人员与离退人员的之和的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技术创新	<i>Innovation</i>	公司年报中披露的技术人员数的自然对数
	政府补贴	<i>Subsidy</i>	上一年度的政府补贴的自然对数
	资产规模	<i>Size</i>	企业当年的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本结构	<i>Lev</i>	企业当年的总负债与总资产之间的比重
控制变量	总资产收益率	<i>Roa</i>	企业当年的净利润与总资产之间的比重
	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	<i>Dual</i>	两职分离赋值为1,否则为0
	董事会规模	<i>Bsize</i>	企业当年董事会总人数
	独立董事规模	<i>Idp</i>	企业当年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重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i>Top1</i>	企业当年第一大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比重
	董事会会议次数	<i>Btimes</i>	企业当年的董事会所召开的会议次数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Donation</i>	12.5787	12.6660	2.2405	5.2983	17.8740
<i>Employment</i>	8.2020	8.1265	1.0475	4.9273	11.3933
<i>Innovation</i>	5.9869	5.9532	1.1541	2.4849	9.7965
<i>Subsidy</i>	16.0546	16.1020	1.7325	6.4770	20.8508
<i>Size</i>	22.2005	22.0353	1.1575	19.5166	26.4873
<i>Lev</i>	0.5131	0.5246	0.1810	0.0318	0.9695
<i>Roa</i>	0.0455	0.0366	0.0553	-0.2014	0.3809
<i>Dual</i>	0.9000	1.0000	0.3060	0	1
<i>Bsize</i>	9.3400	9.0000	0	5.0000	17.0000
<i>Idp</i>	0.3626	0.3333	0.0533	0.0909	0.6250
<i>Top1</i>	36.6295	35.4100	15.41179	7.4500	85.2300
<i>Btimes</i>	8.8900	8.0000	4.1630	3	38

并在1%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078, T值为4.407),表明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来促使企业扩大技术创新投入是可以奏效的,至少在增加技术人员投入方面该补贴是有效率的,结果支持了假设3。

(三) 控股股东性质对政府补贴有效性的影响

由唐清泉、罗党论的研究^[3]可知,政府补贴的效果受到企业性质的影响,这种补贴的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显得更为明显。潘越、戴亦一

等也认为,政府补贴的效果会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21]。因此,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在不同性质股东控股下政府补贴社会性效果的具体表现,本文根据控股股东性质的差异对总样本进行了划分,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两个独立样本。详细结果如表4所示。

表3 总样本下的政府补贴有效性研究

变量名称	模型1 因变量:社会捐赠		模型2 因变量:就业人数		模型3 因变量:技术创新投入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Constant	-6.88***	-4.613	-8.68***	-18.903	-10.74***	-19.526
Roa	5.36***	3.698	0.76*	1.843	1.60***	3.252
Size	0.74***	9.033	0.70***	27.386	0.67***	21.960
Lev	-0.403	-0.834	0.040	0.284	0.106	0.641
Dual	-0.60***	-2.600	0.064	0.898	-0.15*	-1.856
Bsize	0.059	1.278	0.015	1.073	0.03**	1.981
Idp	0.865	0.622	0.440	0.996	0.456	0.868
Top1	-0.01**	-2.495	0.000	0.094	0.002	0.893
Btimes	0.03*	1.688	0.000	-0.032	0.005	0.812
Subsidy	0.17***	3.468	0.05***	3.525	0.07***	4.407
N	775		1023		972	
F	27.922		188.851		138.806	
Adj-R ²	0.238		0.623		0.56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下同。

表4 产权性质不同对政府补贴有效性的影响

变量名称	模型1 因变量:社会捐赠				模型2 因变量:就业人数				模型3 因变量:技术创新投入			
	国有控股		非国有控股		国有控股		非国有控股		国有控股		非国有控股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Constant	-2.690	-1.093	-8.88***	-4.707	-8.10***	-8.978	-8.90***	-15.997	-11.84***	-11.673	-10.07***	-15.018
Roa	3.287	1.159	5.35***	3.193	-0.48***	-0.520	1.12***	2.397	-1.285	-1.266	2.51***	4.454
Size	0.28*	1.940	0.90***	9.088	0.712	13.621	0.70**	23.648	0.77***	13.119	0.62***	17.561
Lev	0.295	0.278	-0.515	-0.950	-0.306	-0.968	0.147	0.920	-0.436	-1.254	0.260	1.384
Dual	0.621	1.014	-0.71***	-2.795	-0.059	-0.304	0.086	1.114	-0.270	-1.171	-0.129	-1.384
Bsize	0.012	0.174	0.097	1.636	0.027	1.103	0.005	0.277	0.000	0.016	0.04*	1.907
Idp	1.872	0.913	0.084	0.046	1.29*	1.662	0.106	0.195	-0.069	-0.080	0.454	0.691
Top1	-0.001	-0.068	-0.01**	-2.382	0.000	0.076	0.000	-0.085	0.002	0.686	0.001	0.358
Btimes	-0.016	-0.448	0.04**	2.036	-0.006	-0.503	0.000	-0.061	0.022	1.593	0.003	0.382
Subsidy	0.45***	5.172	0.080	1.356	0.002	0.054	0.07***	4.013	0.06*	1.797	0.08***	3.983
N	179		596		235		788		222		750	
F	10.126		21.797		47.310		135.487		49.843		88.796	
Adj-R ²	0.315		0.239		0.639		0.606		0.664		0.513	

在社会捐赠方面,政府补贴对企业社会捐赠的激励作用仅在国有控股股东样本中得到体现,而在非国有控股股东样本中激励效果不显著,如在国有控股样本中,政府补贴与社会捐赠间系数为0.455,并在1%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非国有控股样本中,两者间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产生该种差异性的原因可能是国有控股企业很大程度承担着政府的功能^[3]。当政府在某目标上无力施展时,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它们干预经济的首选目标,致使具有国有色彩的企业承担更多的政策性责任。在吸纳就业人数方面,政府补贴可以有效地激励企业增加就业人数规模,但

是这种激励作用仅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如在非国有控股样本中,两者间系数为 0.070(T 值为 4.013),并在 1% 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在国有控股样本中,两者间关系不显著,这是完全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即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在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方面起到更好的作用,能够吸纳更多的就业人数。在技术创新方面,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不受控股股东性质的影响,即无论是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还是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这种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均存在,但从系数和显著性来看,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在非国有控制企业中显得更强,这与刘虹等的研究结论“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对民营企业的 R&D 补贴的效应更显著”^[11]相一致,意味着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在政府补贴的激励下,民营企业可能更加有效地利用政府补贴,从而更有利于政府补贴在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作用。鉴于此,政府补贴社会性效果的确受到控股股东性质的影响,在不同性质股东的控股下,该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假设 2 未能完全得到验证。

(四) 企业经营状况对政府补贴有效性的影响

一般而言,企业的盈利状况会影响企业从事各项相关经营事宜的能力,尤其是面对社会性公益活动时尤为突出,就如山立威、甘犁等所言,“公司的捐款行为与公司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能力相对应”^[17],这意味着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应符合经济学理性。鉴于此,本文根据企业当年的盈亏状况将总样本分为盈利样本和亏损样本。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企业经营状况对政府补贴有效性的影响

变量名称	模型 1 因变量:社会捐赠				模型 2 因变量:就业人数				模型 3 因变量:技术创新			
	盈利		亏损		盈利		亏损		盈利		亏损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Constant	-7.31***	-4.651	-6.354	-0.929	-8.75***	-18.250	-8.68***	-4.229	-10.75***	-18.797	-9.73***	-3.756
Roa	6.96***	4.084	6.471	0.865	0.535	0.979	1.212	0.826	1.30**	2.010	2.503	1.496
LN(size)	0.77***	8.824	0.67**	2.212	0.70***	26.148	0.72***	7.295	0.66***	20.679	0.75***	6.178
Lev	-0.207	-0.403	-1.620	-0.962	-0.085	-0.565	0.769	1.544	0.090	0.507	0.081	0.141
Dual	-0.52**	-2.176	-1.81*	-1.753	0.069	0.929	0.048	0.158	-0.15*	-1.757	-0.297	-0.862
Bsize	0.042	0.894	0.296	1.384	0.018	1.241	-0.023	-0.320	0.03**	2.257	-0.009	-0.112
Idp	0.954	0.661	2.452	0.405	0.540	1.194	-1.320	-0.648	0.729	1.344	-3.523	-1.496
Top1	-0.01**	-2.432	-0.021	-0.893	0.000	-0.248	0.006	0.799	0.001	0.772	0.006	0.680
Btimes	0.026	1.429	0.075	0.967	-0.001	-0.190	0.003	0.112	0.006	0.816	-0.001	-0.044
Subsidy	0.15***	2.888	0.197	1.019	0.05***	3.463	0.049	0.742	0.08***	4.411	0.018	0.235
N	724		51		935		88		890		82	
F	26.225		1.897		174.271		11.929		127.620		7.801	
Adj-R ²	0.239		0.137		0.625		0.528		0.561		0.427	

由表 5 可知,政府补贴的社会性效果仅在当年盈利的企业中存在,意味着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受到企业当年盈亏状况的影响,假设 3 得到了经验证据支持。在社会捐赠方面,政府补贴对企业社会捐赠的激励作用仅在当年盈利的企业中存在,如两者间系数为 0.152(T 值为 2.888),并在 1% 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在亏损企业中两者间正向关系不显著,表明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有能力承担社会捐赠事宜,亏损企业激励效果不显著,“量力而行”,这再次验证了山立威、甘犁等“公司的捐款行为与公司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能力相对应”的观点^[17]。在就业人数方面,政府补贴与企业吸纳就业人数间关系仅在盈利样本中得到体现,并呈现显著正相关性(系数为 0.054,T 值为 3.463),而在亏损样本中,该种激励效果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产生该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具有较强盈利能力的企业有能

力也有动力协助政府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而亏损企业当面临经营亏损时,其最为重要的责任是扭亏为盈,而不是增加企业就业人数,因此在亏损企业中,该种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显得有心无力。在技术创新方面,政府补贴与技术创新间正相关性仅在盈利样本中得到体现(系数为0.082,T值为4.411),而在亏损企业中该种激励效果不显著,这表明亏损企业面临亏损时,其所能付诸努力的便是扭亏为盈,而不是在亏损的基础上增加技术人员的投入、扩大企业创新风险,即便在政府补贴的利益诱导下,这种激励作用也难以奏效,但在盈利企业中,企业在盈利乐观的经营环境下愿意增加创新投入,尤其在政府补贴的利益诱导下,这种政府补贴的激励作用可能更为明显。

(五) 市场化水平对政府补贴有效性的影响

樊纲、王小鲁等认为,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其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般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干预经济的意愿越低,企业利用承担社会效益以便建立政企关系的动机就会越弱,反之相反^[28]。鉴于此,我们根据樊纲、王小鲁等所提供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将总样本划分为高市场化和低市场化两组样本来检验政府补贴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具体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市场化水平对政府补贴有效性的影响

变量名称	模型1 因变量:社会捐赠				模型2 因变量:就业人数				模型3 因变量:技术创新			
	高市场化		低市场化		高市场化		低市场化		高市场化		低市场化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Constant	-7.02***	-3.514	-6.63***	-2.874	-8.01***	-12.085	-9.56***	-14.736	-10.04***	-12.762	-11.38***	-14.658
Roa	4.26**	2.083	6.45***	3.016	1.60***	2.581	0.015	0.027	3.11***	4.296	0.153	0.227
Size	0.75*	6.451	0.73***	5.967	0.66***	16.731	0.74***	21.286	0.57***	12.297	0.73***	17.775
Lev	-0.834	-1.259	0.127	0.173	0.164	0.811	-0.159	-0.789	0.47**	2.051	-0.232	-0.973
Dual	-0.60*	-1.910	-0.552	-1.567	0.066	0.638	0.053	0.537	-0.182	-1.521	-0.123	-1.014
Bsize	0.053	0.791	0.074	1.131	-0.006	-0.256	0.026	1.461	0.036	1.413	0.034	1.510
Idp	2.431	1.229	-0.990	-0.486	0.429	0.646	0.449	0.759	1.028	1.360	0.076	0.103
Top1	-0.012	-1.613	-0.01**	-1.987	-0.001	-0.426	0.001	0.376	0.002	0.728	0.000	-0.066
Btimes	0.024	0.923	0.039	1.546	0.008	0.887	-0.007	-0.889	0.02*	1.935	-0.003	-0.335
Subsidy	0.15*	1.944	0.17***	2.611	0.05**	2.205	0.06***	3.449	0.12***	4.074	0.05**	2.419
N	397		378		520		503		495		477	
F	14.856		12.672		88.412		104.672		71.113		70.046	
Adj-R ²	0.239		0.217		0.602		0.650		0.560		0.566	

在社会捐赠方面,政府补贴与企业社会捐赠间的显著正相关性不受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无论在市场化较高的地区,还是在市场化较低的地区,两者间关系均显著,但是相对于市场化较高的地区而言,政府补贴的社会捐赠效果在市场化较低的地区显得更强。在就业人数方面,政府补贴与企业吸纳就业人数间的显著正向关系在高市场化和低市场化两样本中均得以体现,但这种激励效果在低市场化地区中更为明显。在社会捐赠和吸纳就业人数方面,相对于市场化较高的地区而言,政府补贴在市场化较低地区企业中的效果显得更为显著,产生该种现状的原因可能是:一般而言,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由于地区市场竞争激烈,政府干预经济频率较少,市场中资源配置往往通过市场化原则进行,企业与政府间关系更为透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否受政府干预较少,但是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干预经济频率较高,由于大量的企业发展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企业往往通过与政府搭建“关系网络”方式来获取政府控制的资源,而企业社会捐赠、缓解就业压力就是其中一种搭建“关系

网”的有效方式。

在技术创新方面,无论是在高市场化地区,还是在低市场化地区,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间正向关系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影响系数大小和显著性高低来看,相对于低市场化地区的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效果在高市场化地区显得更强,这表明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通常所面临的是日益增加的市场竞争压力,只有突破原有的技术、管理模式和理念,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强度,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一席之地,尤其在政府补贴利益的驱使下,企业扩大技术创新投入就显得更为明显。而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由于地区竞争压力较小,企业往往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就获取发达地区的技术,便捷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此时政府补贴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相对较弱。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目前来看,对企业提供财政补贴已成为各地政府普遍采取的一种财政激励行为,这种补贴在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引导经济走向、维持社会稳定、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3,14],但研究者们对政府补贴有效性的评价褒贬不一^[5-7,9,12]。鉴于此,本文以2008—2011年中国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视角,对政府补贴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社会慈善捐赠、吸纳就业人数和技术人才投入)之间的关系,即政府补贴的社会性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企业社会慈善捐赠额与政府补贴间呈显著正相关性,表明政府通过增加财政补贴的形式来有效地激励企业扩大社会慈善捐赠额是具有可取性的。但是,在企业社会捐赠方面,政府补贴的社会性效果受到企业控股股东性质、当年盈亏状况和所在地区市场化指数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政府补贴的社会性效果仅在国有控股企业或盈利企业中存在,且不受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但相对于市场化较高的地区而言,市场化较低地区企业的政府补贴效果显得更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或亏损企业中,这种政府补贴的激励机制是失效的。

其次,企业吸纳就业人数与政府补贴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吸纳社会就业人数方面政府给予上市公司的财政补贴的确是产生了社会效益,我们可以认为政府所给予的补贴是有效率的,也是理性的。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补贴的社会性效果仅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且不论在高市场化地区,还是低市场化地区,政府补贴的社会性效果均有体现,但在低市场化地区企业该效果显得更强。另外,在区分企业盈亏状况时我们发现,政府补贴在吸纳就业人员方面的社会性效果并非一直有效的,政府补贴在吸纳就业人员方面的激励效果仅在盈利企业中存在。

最后,企业技术人员投入与政府补贴间呈显著正相关性,意味着在技术创新投入力度方面,政府通过增加财政补贴额度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也是有效的,至少是在扩大技术人员的投入方面是有效的。然而,在区分控股股东性质、盈亏情况和市场化程度后,我们发现,政府补贴的技术创新激励效果不受企业控股股东性质、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但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或低市场化地区的企业)而言,这种技术补贴效果在非国有控股企业(或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显得更强。另外,政府补贴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激励效果仅在当期盈利企业中得到体现。

从上述研究结论可知,政府欲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来激励上市公司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是可取的,也是有效率的,尤其是在激励企业社会捐赠、吸纳就业人数和技术人才投入等方面,该种政府补贴可能更为有效。但是,由于企业控股股东性质、盈利状况和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差异性,政府所给予的财政补贴并非起到同样的激励效果,甚至有可能是无效的。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时有必要深入了解企业控股股东所有制情况、当年盈利状况和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这样才能确保政府补贴在社会公共治理中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提高政府补贴的社会公益效应和整体福利水平。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1)在样本的选取和来源方面,本研究仅选取

中国沪市 A 股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这可能造成了本研究成果适用领域的局限性,即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政府补贴效果是否普遍适用于其他行业呢?这是值得我们继续深思和进一步考证的问题。(2)在政府补贴的效果方面,本研究仅选取了有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指标,未能对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作深入探究。一般而言,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主体,企业在对政府补贴进行直接反应的同时,首先考虑的应是企业自身盈利能力,这样才符合经济理性,遗憾的是,本研究尚未对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进行探究,但显然这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陈冬华. 地方政府、公司治理与补贴收入——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财经研究,2003(9):15-21.
- [2]张建君,张志学.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J]. 管理世界,2005(7):94-105.
- [3]唐清泉,罗党论. 政府补贴动机及其效果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2007(6):149-163.
- [4]张敏,马黎珺,张雯. 企业慈善捐赠的政企纽带效应——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13(7):163-171.
- [5]Jenkins J C, Leicht K T, Jaynes A. Do high technology policies work?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employment growth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1988—1998[J]. Social Forces, 2006, 85:267-296.
- [6]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 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J]. 经济研究,2010(3):65-77.
- [7]申香华. 成长空间、盈亏状况与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绩效——基于 2003—2006 年河南省和江苏省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J]. 财贸经济,2010(9):64-69.
- [8]薛爽,肖星. 捐赠:民营企业强化政治关联的手段? [J]. 财经研究,2011(11):102-112.
- [9]Harris R I D. The employment creation effects of factor subsidies: some estimates for Northern Irel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1955—1983[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91, 31:49-64.
- [10]戴晨,刘怡. 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对企业 R&D 影响的比较分析[J]. 经济科学,2008(3):58-71.
- [11]刘虹,肖美凤,唐清泉. R&D 补贴对企业 R&D 支出的激励与挤出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管理,2012(4):19-28.
- [12]肖志兴,王伊攀,李姝. 政府激励、产权性质与企业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260 家上市公司数据[J]. 财经问题研究,2013(12):26-33.
- [13]Tzelepis D, Skuras D. The effects of regional capital subsidies on firm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004, 11:121-129.
- [14]邵敏,包群. 政府补贴与企业生产率——基于我国工业企业的经验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12(7):70-82.
- [15]罗党论,唐清泉. 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2009(7):84-96.
- [16]张敏,张胜,申慧慧,王成方. 政治关联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10(11):143-153.
- [17]山立威,甘犁,郑涛. 公司捐款与经济动机——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捐款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08(11):51-61.
- [18]Qian Yingyi, Roland 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1143-1162.
- [19]耿强,胡睿昕. 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3(6):80-90.
- [20]Li Hongbin, Zhou Li'an.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1743-1762.

- [21] 潘越,戴亦一,李财喜. 政治关联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助——来自中国 ST 公司的经验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2009(5):6-17.
- [22] 王凤翔,陈柳钦. 中国地方政府对本地竞争性企业财政补贴行为研究[R]. 南开大学工作论文,2005.
- [23] 陈运森,朱松.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投资[J]. 财经研究,2009(12):27-39.
- [24] 刘慧龙,张敏,王亚平,吴联生. 政治关联、薪酬激励与员工配置效率[J]. 经济研究,2010(9):109-121.
- [25] 余明桂,潘红波.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 管理世界,2008(8):9-21.
- [26] 罗党论,甄丽明. 民营控制、政治关系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2008(12):164-178.
- [27] 罗党论,刘晓龙. 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09(5):97-106.
- [28]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0 年报告[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黄 燕]

A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of Manufacturing in Shanghai Stock Market

WU Chengsong, HUANG Songqin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manufacturing from 2008 to 2011 as a research sample, we make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enterprise social benef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enterprises undertak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subsidies do have social benefits. Namely, government can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expand social donations, undertake more employments and increase technical personnel by giving subsidies. Further studies show that: (1)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have different performance in corporations with different natures. (2)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exist only in profitable corporations that year, indicating that government subsidies are affected by profit or loss. (3)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has no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market development, but its significance is varying in different levels of market development. As for public policy, it's effective that government encourages enterprises to tak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by giving subsidies, but government must also take enterprise feature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nto accou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Key Words: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connections; market index; transferred payment;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corporate dona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ocal government subsidies policy; gam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